

刘世英◎主编

如何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如何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如何兼顾效率、公平与正义
——经济学家的心结和良知的拷问

十大经济学人

解读 10 位经济学人的探索旅程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10

刘世英◎主编

十大经济学人

解读 10 位经济学人的探索旅程



中国铁道出版社
CHINA RAILWA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大经济学家:解读 10 位经济学人的探索旅程/
刘世英主编. —北京:中国铁道出版社,2013. 7
ISBN 978-7-113-16546-8

I. ①十… II. ①刘… III. ①经济学家—生平事迹—
中国—现代 IV. ①K825. 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96322 号

编委会

总 顾 问 章知方
主 编 刘世英
副 主 编 陈志华 李良忠 彭征明 邹 琦 李浩燃
参编人员 王雪晶 孙美玲 杨浙帅 江 楚 廖思捷
徐念峰 魏 平 魏泓飞 张 磊 郝雅琴

书 名: 十大经济学家——解读 10 位经济学人的探索旅程
作 者: 刘世英 主编

责任编辑: 王淑艳 电话: 010-51873457
封面设计: 王 岩
责任校对: 龚长江
责任印制: 赵星辰

出版发行: 中国铁道出版社(100054,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 8 号)
网 址: <http://www.td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华丰印刷厂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00 mm×1 000 mm 1/16 印张: 12.25 字数: 186 千
书 号: ISBN 978-7-113-16546-8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买铁道版的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者,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

前言



“经济”一词，我们每个人都再熟悉不过了。它既频频出现在滚动播出的新闻报道中，也会被老百姓在茶余饭后所谈论。但究竟何谓经济？

经典的经济学教科书告诉我们，经济包括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围绕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就算一个人对时局时政再漠然，他仍然逃脱不了经济形势、经济环境对其个人生活的影响，而经济行为更是一个人生存与发展的基本行为。

这便是经济的影响力与魔力。于是，当经济学在今天成为一门颇受追捧的“显学”之时，人们丝毫无需见怪。同样，在“坐而论道”的学界，经济学家也异常“显赫”——知名经济学家的意见和观点，甚至能够对国家的经济决策产生深远影响。当下，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经济学家们堪称最为重要的智囊集团。

“经世济国”，这是经济学家的至高境界。作为社会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学与社会、时局联系紧密，经济学家们通常也是社会活动家。但中国的经济学家往往具有双重特质：既“入世”又“出世”。这个群体密切关注国家大政方针、经济运行形势，也潜心治学，著书立说；他们会及时表达自己的意见、发出警报，却也在学术的深海中游刃有余。60年，历史长河浩荡，中国涌现出一大批有胆有识、胸怀社稷的优秀经济学家，他们不仅教书育人、研究学问，带领中国经济学界稳步向前、走向世界，还情系祖国、心系民众，希冀自己的学识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聚光灯下，有光环，亦有争议。经济学的学科地位注定了经济学家们不会陷入寂寞，同时也昭示着他们必须背负争论。我们不可能要求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能站在普通大众的立场、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但我们宁愿相信，多数的经济学家都心存良知与美好，为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的福利尽心竭力。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这种信念尤为重要。基于此，我们倾向于在本丛书中，单独为这一群体著书。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前的30年，还是改革开放后的30年，知名的经济学家不胜枚举。我们从中有针对性地选择出10人，讲述他们个人成长的历史、奋斗的故事、人生的轨迹，是非功过由读者自断。经济领域的改革向来牵一发而动全身，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依然需要经济学家的谋划和韬略，让我们更多地关注他们，尝试了解他们，尽力理解他们。

参与本书写作的作者：江楚（第一、第二章），张磊（第三章），郁雅琴（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章），徐念峰（第七、第八章），张曼如（第九、第十章）。

本书如有错误和不足之处，欢迎读者将您的批评意见反馈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gt-sunstone@163.com，谢谢！

本书编委会

目录

第一章 一代经济学大师——董辅初 1

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就勇敢地提出了企业改革的方向应该是“政企分离”,“政社分开”的政策性建议;他最早提出并一直坚持的所有制改革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关键,他在这方面的研究和理论使他享誉海内外。

初出茅庐	3
敢为天下先,提出“两个分开”	4
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	7
关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	10
守身为大	13

第二章 中国经济的预测大师——萧灼基 17

他首次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国有企业所有权和使用权(经营权)“两权分离”的改革。他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关键”,“在商品经济下要率先强化市场经济作用”等观点,为改革做出了前瞻性的贡献。

勇闯“禁区”	19
50载撰写革命导师传记	21
理论先锋,纵论“股”“金”	24
中国经济的预测大师	27

第三章 市场经济的旗手——吴敬琏 33

几乎从文革开始,吴敬琏就树立起了市场的观念并终其一生为市场

目录

奔走呼号,在被攻讦、被指责得最厉害的时候,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市场或许不是万能的,但走市场道路却最终成为中国人唯一的选择,并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积累。

一生的市场经济信徒	35
“吴法治”审视改革	43
“是非”吴敬琏	46

第四章 经邦济民的股份制巨擘——厉以宁

51

作为中国第一个提出股份制构想的经济学家,厉以宁被称为“厉股份”。面对批评和质疑,厉以宁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促使股份制形式写入中央文件。

代报志愿,成全才子效国赤情	53
把脉中国,“非均衡发展”切中改革内核	56
拨云撩雾,“厉股份”力推所有制改革	58
力挺民企,“厉民营”首倡“非公经济 36 条”	61
情系民生,“三农”“医保”常放心头	65
诗化人生,“厉吴之争”殊途同归	67

第五章 走向世界的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

71

从台湾到内地,从北京大学教授到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传奇之路,存留着现代中国历史沧桑和风云变幻的烙印,也被看作是现代中国崛起对世界影响的一个见证。

弃武从文,金门马山连长神秘“失踪”	73
师从舒尔茨,“海归”精英钟情本土研究	76
出入庙堂,政府智囊把脉中国经济	79

目录

搭台架桥,“和而不同”打造改革智库	83
任职世行,带“中国经验”走向世界	86

第六章 “替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茅于軾

91

他宽容平和,关注民生问题,被认为是当今中国最值得尊敬的知识分子之一。《世界商业评论》对他的评价是:把经济学讲得最清楚的人。

半路出家,从火车司机到经济学家	93
随笔论经济,语不惊人死不休	95
赤心做实事,心系苍生情悠悠	102
同舟共济,携手贤妻共筑“乐”园	106

第七章 平民经济学家——樊纲

111

独到的见解、敏锐的洞察力,犀利的学术观点。多年来,被称为“平民经济学家”的樊纲不人云亦云,而是用独立的思考实践着他“经济学家最重要的品质是尊重科学”与“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的学术理念和人生信条。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113
专注十年磨剑,厚积一朝薄发	115
号脉中国问题,预警中国经济	117
立创经济言论,不避他方争议	121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123

第八章 饱受争议的经济学家——张维迎

127

张维迎,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经济学家。他在国内最早提出并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思路,主张国家退出经济领域,让万能的自由市

目录

场主导经济,国企改制。他的企业理论及有关产业改革的理论成果影响广泛。

勤学善思,脱颖而出	129
首次系统论证双轨制价格改革	131
牛津求学,知难而进	134
天下兴亡,知识分子更有责任	138
长达 25 年的争议	142

第九章 学者态度,猎人风采——周其仁

149

这是一个被称为“周奇人”的经济学家。他执著于现实世界,为人们认识、理解改革以及改革的必要性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他独立于镁光灯外,为“众人之事”摇旗呐喊,为改革之路修枝剪叶、保驾护航。

初出茅庐,风云际会	151
治学独特,举重若轻	155
穷追猛打,敢问敢言	158
笑面危机,势“逼”新路	163

第十章 特立独行,坚持自我——郎咸平

167

他每每语出惊人,一次又一次把自己推上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从普通学者到学术明星,他并不讳言存心利用媒体炒作,但坚持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学者该做的事情。

首战德隆,声名鹊起	169
一人谔谔,勇掀论争	172
傲对千夫,旋风依旧	177

参考文献

183

一代经济学大师——董辅初

董辅初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代经济学大师。他是最早倡导“企业改革”、“政企分开”等市场经济准则的人；他在理论实践方面为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被认为是少数能够影响中国政府重大决策的学者之一；在他50年的学术生涯中，不管是研究计划经济，还是研究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转轨经济，他都取得了令人羡慕的成就。正如经济学家郎咸平的评价：“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他们的努力，我们的生活也许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董辅弼

- ◆ 1946年，考入武汉大学，大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
- ◆ 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留校任教。
- ◆ 1953年，开始在苏联留学，1957年获经济学副博士学位。
- ◆ 1988年至1998年，董辅弼担任第七、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
- ◆ 1998年至2002年，任第九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 ◆ 2004年7月，因病逝世。

初出茅庐

每年7月30日，武汉大学的部分师生会照例来到位于郊区的石门峰名人文化园，在一座墓地前，献上一簇簇黄菊，缅怀一代经济学大师董辅初，表达内心的敬意。

一方苍松翠柏环绕、绿草茵茵的山坡上，竖立着一座雕像。墓碑上方写着：董辅初，1927~2004，下面还写有一行字，“他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他完成了一项伟大的使命”。言简意赅的两句话，精辟地总结了他的一生。

1927年7月26日，董辅初出生于浙江宁波一户普通百姓家庭。董家共有兄弟姐妹六人，他排行老二。上有大姐，下有三弟一妹。家境贫寒。

1946年，聪颖好学的董辅初考入国立武汉大学经济系。当时，这里是国内研究经济学最活跃的地方，会聚了一大批知名经济学者。经济学，这门古老又年轻的学科，在他面前打开了一扇视野开阔的窗户，从此，他和经济学结下不解之缘，相伴一生。

在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经济学家张培刚等教授的教导下，他接触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课堂外，他自学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今后的理论与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武汉大学4年求学期间，董辅初并没有固守书斋自我封闭。他参加了各种学生组织，学生运动少不了他的身影。他一度被选为校学生会主席，成为学生领袖。在校期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迎来了新中国成立。1950年大学毕业，他留校任教。

两年后，董辅初远赴莫斯科继续求学，并于1957年获得莫斯科国立经济学院授予的副博士学位。留苏期间，他的才华给前去访问的孙冶方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1957年毕业回国后调入孙冶方任所长的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即以后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后来他成为这个研究所的终身名誉所长。

董辅初大学毕业工作后，除了把父母接来一起生活，他更是承担起资助兄弟上学的大责任。

二弟董辅桢眼中的大哥有个古怪的脾气。比如吃饭，不像别人一本正

经地细嚼慢咽，经常是边吃饭边看报或稿件什么的，常常顾不上夹菜，一碗饭几口菜就完了。再说穿衣，冬天北京户外再冷，他上身一件衬衣和灰色夹克，下身一条长裤就可以了。什么棉衣、毛衣、毛裤一概不需要。

后来，母校武汉大学授予他“杰出校友”荣誉称号，并聘请他为经济学教授。

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博导邹恒甫回忆了一件事。1994年，武汉大学高级研究中心正式挂牌，办公室的第一台空调就是董老捐钱买的，那时的空调算奢侈品，一台要8000多元人民币。董老还号召他的学生们都来支持他，鼓动其所有在外做大事的学生给中心捐钱。

敢于直言，实事求是，高风亮节，不阿谀奉承——这是与他有过接触，哪怕是一面之交的人，对他评价最多的话。

早在1959年，董辅初就创作了论文《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若干方法论问题的探索》，论文发表后，他在业界声名鹊起。日本学者山名正孝称他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称赞文章“向理论上解决‘国民收入分配率’和‘生产构成的比例’的相互关系这个问题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山名正孝就是第一位称赞董辅初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的人，从此以后，这个称呼就一点点传播开来，成为国内外公认的一种说法。

在论文得到肯定后，董辅初提出了关于再生产数量关系的数字模型，被誉为“中国经济成长论的代表”。现在看来，董辅初最有国际影响的理论贡献当属他的经济增长论。包括三个方面：社会主义再生产模型，国民经济平衡理论，国民收入理论。尤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董氏再生产模型”最为著名。该模型参照部门联系平衡表表式，并吸收美国经济学家列昂惕夫投入产出分析法的一些优点，设计了别具一格的平衡表，是当今世界和中国流行的许多再生产模型中最符合马克思主义再生产原理的一种。

敢为天下先，提出“两个分开”

20世纪80年代初，董辅初敏锐地洞察到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的原因是仅仅进行了经济运行机制的改革，没有进行所有制改革，他大胆地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对所有制实现形式进行改革，才能取得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

1978年9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一次研讨会。董辅初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这次会议主题为“按劳分配大讨论”。当时的社会形势仍以吃大锅饭为主，干多干少一个样。董辅初所提出的观点犀利，闻所未闻。他提出，要改革国家所有制，实现政企分开；改革人民公社所有制，实现政社分开。这就是非常著名的“两个分开”。1978年，中国的政治气候还是乍暖还寒的时候，董辅初提出了“两个分开”的历史性呼吁，此语一出，石破天惊。

有学者认为：“两个分开”的理论，吹响了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革的第一声号角。

当时，一位老先生对他说：“老董啊，你的胆子可真大，‘人民公社’是毛主席提出来的，你提出‘政社分开’是要冒风险的！”

现在看来，这两个观点早已不算多么新颖。但在1978年，在计划经济时代，“两个分开”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炸开了锅。因为思想超前的言论，他受到了责难。

不久，改革开放春风吹满神州大地。他的观点逐渐被印证，事实胜于雄辩：他说对了。

1979年1月，他又发表了《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所有制实现形式问题》一文，尖锐地批评了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直指传统国家所有制形式的弊病。接着，一系列堪称“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基础”原理的提出和探讨，成为他最出色的手笔。尤其是他的“社会主义经济应当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理论，更是充满锐意和超前意识，被人称为“董记八宝饭”理论。

一把利剑捅了“马蜂窝”！董辅初因为这个理论提得太早了而受到了批判，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前行。

在1985年，他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熟悉中国近30年经济制度变迁的人们必然对董先生的理论倍感亲切，某种意义上，可能正是董先生的理论先行，带动了高层关于经济制度的有限变更。

1993年，董辅初进一步提出，改革必须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即摒弃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1997年，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就正式提出，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又被写进了宪法。这种具有里程碑式的法学表述，让人们再一次想到了董辅弼20年前就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问题，想到了10多年前董辅弼提出的那个著名的“八宝饭理论”。

现在，他的理论观点，几乎都成为党和政府的文件语言。但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这些理论，却需要有超常的理论勇气。

也正是因为这些言论，董辅弼被认为属于少数能够影响中国政府重大决策的学者之一。

业内人士认为，董辅弼之所以能做到走出书斋，经世致用，与他自己的经历和实践有关。

他对计划经济的弊端认识得较早。早在留苏期间，董辅弼就真切地感受到了苏联经济并不是白璧无瑕，也存在不少问题：经济结构不合理、生产效率低下、商品严重短缺等。因此，他对计划经济体制不迷信。其次，他是改革开放初期就能够亲眼目睹中国与发达国家悬殊差距的为数不多的人物之一。1978年以后，董辅弼多次出国考察，足迹遍及五大洲，他对外国的经济发展、经济体制了解较多、研究较深，因而对传统体制的缺点也看得比较清楚。

再者，他的青少年经历和家庭背景，使他对商品、市场机制、价值规律等有许多鲜活的认识。此外加上董辅弼在新中国成立前受过西方经济学的系统训练，有敏锐的头脑，有精深的经济理论分析工具，又具有从宏观上把握现实问题的能力，还有从青年时代就形成的实践意识和报国热情。这些综合因素，使董辅弼能不断地取得成功，提出正确的经济理论。

而董辅弼自己，曾表示“中国的经济学界需要真正有恒心的、敢于坐十年甚至几十年冷板凳的学者”。目前我国经济学家的“急功近利”的心理太重，这表现为浮躁，缺少对经济现象的长期的思考与研究。存在早日成名、早日出成果心理者众，而埋头做学问、具有扎扎实实功夫者显得欠缺。董辅弼觉得，缺乏对经济学众多学科深入持久的研究，对于经济学的发展不利，会导致经济学发展缺乏坚实的基础，董辅弼先生生前还劝告，在国外培养的经济学家需要扎根于中国社会深处，去了解活生生的现实。他曾感叹：“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国外，他们也在研究中国经济，但

有些人脱离中国实际，谈起中国经济就不免‘隔靴搔痒’。”

董辅初总是那样忙碌，但从没因为忙而落下什么。著述、演讲、修改论文、社会活动、政务活动，从来也不拒绝别人求助的要求，总是用经济学家运筹的本能，合理配置时间。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忘我工作，这就是他习以为常的生活。董辅初的著述甚丰，学术成就卓绝，这来源于他的天资，也来源于他的勤奋。据董辅初的学生回忆，倘若问熟悉董老师的人，说出董老师的两个特点时，除了已经被广泛流传的：即无畏寒冬酷暑，他的行头从来都是在加一件罩衣和减一件罩衣之间轮换，总是精神抖擞、精力充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董老师写作的抗干扰能力极强，不论在空中旅行还是在火车途中，不论是在住旅店时的空闲还是在会议的间歇，他都可以如入无人之境，沉溺和耕耘于写作的空间。董辅初的《市场经济漫谈》就是这样写就的，他还为香港的报纸撰稿，一两千、三四千字不等、哲理和生活逻辑极强的短文，每星期一篇，期期不落，就是这样的写作造就了几十万字著作。

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

董辅初的前瞻性和勇气使他在学界最早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与之相伴一生是他一直以来对于私有财产、民营经济的保护和发展所进行的不遗余力的摇旗呐喊，这一度被扣上冒进的帽子。为了解决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题，董辅初曾是风险投资、创业板、民营银行的积极倡导者。他是研究中国民营经济的资深经济学家，力主发展民营经济，被称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辩护人”。

20世纪80年代，以民营经济起家的“温州模式”受到排斥和怀疑。1986年，董辅初等亲赴温州调查，之后发表考察报告《温州农村商品经济考察与中国农村现代化道路探索》，称赞“温州模式”为“发展农村商品经济、治穷致富”的“一条可供选择的路子”。这是经济学界最早站出来为“温州模式”辩护的论著之一。此后，他又连续撰写了《温州模式与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温州模式的继承和提高》等系列文章，精辟地解析温州经济，对全国各地学习温州提出了独到的意见和建议。

董辅初还是开放民间金融，开设民营银行的积极支持者。他和老一辈

经济学家刘国光、黄达、吴敬琏、茅于軾等人组织成立了长城金融研究所，该机构成立的目的是要拿出建立民营银行的方案，选择银行改革的样板模式，为民间金融鸣锣开道。

作为政协委员，他是将私有财产保护写入宪法的积极推动者。2002年12月，他在“十六大与新世纪的中国经济”论坛上表示，没有私有财产就没有私营经济，没有私营经济的发展，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公有制经济是不可能建立市场经济的。保护私有财产就要承认其合法的劳动收入。同时，对合法的非劳动收入也要保护，包括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均应按照其贡献参与程度分配所得。股份公司这样的所有制形式出现以来，社会财富逐渐公众化、社会化。

2003年，董辅弼在接受《远东经济画报》的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前在理论上保护私人财产的问题一直是一个禁区，随着我国实行市场经济，这个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原因主要在于三个方面。

第一，只有明晰的产权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权必须是明晰的，只有明晰的产权才会有市场，才会有商品交换，可以设想，如果没有私人财产就不会有商品交换，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第二，市场经济是靠竞争来优化资源配置的，而参与市场竞争的各个主体必须有自己的财产，而且他的财产能够得到有效的保护，他才能参与到市场竞争经济中来，否则财产的拥有者就不会有竞争的动力；第三，我们要建立小康社会，那就要让更多的人增加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资本社会化的倾向，也就是说社会上的很多人可以拥有资本，越来越多的人会成为有产者，很多人除了劳动收入之外，还可以买股票、买债券、买房、开店等等，不仅有消费性资产，而且有投资性资产，如果不对他们的财富的累积加以保护的话，那么就很难达到全面小康的目标。

“所以说保护私人财产的问题不是一个小问题，它是一个关系到我们能不能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能不能进入全面小康社会的大问题。”

而在当时，国家对于私人财产的保护还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地步，侵犯私人财产的现象还屡有发生。特别是在私营企业中表现得更加明显，比如乱收费、乱收税、各种各样强制性的赞助等，这些都是侵犯私人财产的现象，更为严重的是，有些地方还以不公正的行政、法律手段强行介入